



城市解放
纪实丛书

CHENGSHI JIEFANG JISHI CONGSHU

重庆

1949.11.30

解放

重庆市档案局(馆) 编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文史出版社



城市解放
纪实丛书

CHENGSHI JIEFANG JISHI CONGSHU

重庆

1949.11.30

解放

重庆市档案局(馆)◎编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解放 / 重庆市档案局(馆),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9

(城市解放纪实)

ISBN 978-7-5034-9485-7

I. ①重… II. ①重…②中… III. ①西南战役(1949) —史料 IV. ①K26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4060 号

责任编辑: 詹红旗 刘 夏 殷 旭 戴小璇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35

字 数: 745 千字

版 式: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城市解放纪实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李明华

副主任 胡旺林 王绍忠 付 华 刘鲤生

主 编 李明华

副主编 徐 峰 许卿卿 焦东华

《重庆解放》编委会

主 审 李华强 徐塞声

主 编 唐润明 艾新全

编 辑 重庆市档案局（馆）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说明

一、《重庆解放》一书（以下简称本书），由重庆市档案局（馆）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辑，其中有关重庆解放的档案史料，主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搜集提供，其他档案及文献资料，则来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二、因系史料汇编，加之又系国共两党、两军生死决斗时期的档案文献，故文稿中保存有撰写时代较多的“时代用语”。为维护历史的真实面貌，保持档案文献资料的原始性，本书在收录时一律未作改动。

三、本书所收录的档案文献，无论其有无标题、标点，均由编者在编辑时重新拟定标题并重新标点，如沿用原标题者，则于脚注中说明。

四、本书在编辑体例上，系按专题分类，同一类别中，相应内容集中，再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文末注明其档案或资料出处。

五、本书所收录的档案文献，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同属一事，且彼此间有紧密联系者，以一事为一题，下属各单项标题以时间的先后顺序表示之且一般采用原标题。

六、本书在编辑过程中，编者如有需要向作者解释或说明的地方，一律采用脚注方式。

七、本书所收录的档案文献，数字的使用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规定，书中年份，原文为公元者，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原文为民国纪年者，用汉字表示；部队、工厂番号，用汉字表示；其他的数字，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书所收录的档案文献，凡遇残缺、脱落、污损的字，经考证确认者，加□并在□内填写确认的字；无法确认者，则以□代之。错别字的校勘用〔 〕标明之。增补漏字用〔 〕标明之。修正衍文用〈 〉标明，内注明是衍文。改正颠倒字句用（ ）标明，内注明是颠倒。整段删节者，以〈上略〉、〈中略〉、〈下略〉标明之；段内部分内容删节者，以〈……〉标明之；文件附件删略者，以〈略〉标明之。

九、本书所收录的档案文献，原稿多为竖排，文中的如左如右，编辑过程在左、右后面一律加〈 〉，并在〈 〉内加上“下、上”字，如原稿中的“如左”，改为“如左〈下〉”，“如右”改为“如右〈上〉”。

编 者

2016年10月28日

城市解放纪实系列丛书总序

国家档案局局长 中央档案馆馆长 李明华

6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许多城市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人类记忆中留下了浓重的印记。

在城市解放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珍贵档案。这些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于人们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极为重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将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进行综合整理、开发利用，是一项重要的文化积累工作和系统的城市记忆工程。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要求，我们组织编纂了城市解放纪实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是利用各有关档案馆馆藏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编辑的反映城市解放前后真实历史情况的大型档案文献汇编，内容包括解放前夕相关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概况；人民解放军政治攻势、战役战斗等军事斗争情况；城市解放后的接管政策、接管过程、各界反映；接管城市后的政权建设、城市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的情况。

城市解放系列丛书主题鲜明，材料翔实，记述客观，信息量大，不仅适用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而且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是一部具有思想性、史料性、可读性的精品读物，是以档案反映城市解放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系列性文献。这套系列丛书的编纂，是档案工作者记录历史、

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生动体现，是各有关档案馆联手协作、整合资源、打造精品，走大编研之路的有益实践，是发挥档案历史记忆功能和资政育人功能的重要方式，是全国档案系统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献上的一份厚礼。

总结历史，不仅仅为了纪念和追忆。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社会各界读者更加详细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腐败专制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政权的历史过程，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更加切实地感受新中国不断发展前进的步伐，从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热爱我们伟大的国家，建设好我们伟大的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重庆的解放与接管

(代序)

唐润明 艾新全

1949年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喜获解放。重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解放的最后一座特大城市；重庆的解放，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命令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幻想的彻底破灭，同时为解放西南全境进而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挺进大西南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旋即强渡长江，于4月23日解放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5月27日解放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国民党当局被迫迁往广州。蒋介石则妄想重温抗战时期以重庆作“战时”首都、以西南为“复兴”根据地的旧梦，决定将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所部主力撤往西南，集结于川东、川北一带，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为部署西南及四川的防务，蒋介石于8月24日自广州飞抵重庆，29日召集川、黔、康各省主席及川陕甘、川鄂湘各将领于西南长官公署举行高级军事会议，确定了以陕南和陇南为决战地带，拒我人民解放军于川境之外的作战方针。10月中旬，华南重镇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再次宣布迁都重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也大多群集于此。重庆自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约三年半的时间内，再次成为国民党的“首都”和统治中心，成为国民党败退大陆前控制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

的残余势力，粉碎蒋介石割据西南的阴谋，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党中央即着手筹划解放大西南事宜，5月23日，中央军委确定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决定“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一野在占领西北的兰州、宁夏、青海后，则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巩固西北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放贵州、四川、西康三省。”为截断敌人逃窜的后路，彻底消灭西南之敌，毛泽东还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和军政兼施、恩威并重”的战略方针，并明确指示：“小平须入川”。随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又从战略战术上对解放大西南作了全面、具体部署。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二野前委在全面分析敌情之后，于1949年7月中旬在南京召开二野高干会议，制定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为解决西南解放后干部缺乏问题，二野在上海和江浙地区招收进步学生和青年，组成西南服务团，随军西进；二野前委、中央社会部、华东局及在香港的党组织还陆续派出先遣人员前往重庆和西南各地，进行统战策反和情报工作。在军事战略上，为迷惑敌人，保证对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二野前委一面让活动于陕南、鄂西的第19军佯动吸引敌人；二野指挥机关也有意由南京绕道郑州，佯装解放军要从陕南、川北入川的态势，以此迷惑敌人，使之将其主力部署于陕南、川北一带，从而掩护人民解放军从鄂西、川东一带向重庆及西南进军。

194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所部下达《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并上报中央军委，指出：“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为达此目的，刘、邓首长指示二野五兵团和三兵团10军，要以极其迅猛的动作，出敌不意地挺进贵州，直出川南，于11月20日以前攻占贵阳、遵义及黔西地区，12月10日以前进击宜宾、纳溪之敌，以切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同时以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组成左集团，于11月20日以前攻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监视川东地区之敌，进而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最后与五兵团协同聚歼川东及重庆地区之敌。10月23日，刘、邓等二野首长在湖南常德发出向川黔进军的作战部署，决定二野主力仍遵照8月19日所下达命令的方向和时间，实施向川黔进军作战。其中五兵团应在11月15日以前攻占贵阳，于11月25日前攻占毕节，于12月10日前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带；三兵团则于11月15日前攻占思南、永绥、永顺之线，11月25日前攻占遵义、黔江、彭水之线，12月10日左右攻占泸县、江津地带。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基本完成了进军西南的各项战略部署，只待中央军委的进军命令了。

与此同时，为了深入调查重庆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内部情况，加强统战策反和情报搜集的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8月，第二野战军敌工部部长杨松青、情报处

处长柴军武带人到武汉设立办事处。他们通过各条渠道，物色、落实了合适的策反和情报人员，先后向包括重庆在内的西南国民党军派遣了90多人。同时还调查了解了重庆和西南地区的哥老会、会道门、地方游杂武装等方面的情况，并向二野政治部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建议。农工民主党秘密党员刘宗宽此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他早在抗战时期就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联系，重庆解放前夕，他与二野派来的情报人员房显志取得联系，把蒋介石召集“林园会议”时所制定的作战部署送到二野手中。其主要内容是：“西南长官公署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作战计划；战斗序列，包括川康滇黔四省以及新设立的川鄂黔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的兵力部署；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的兵力部署；机动兵力罗广文兵团在重庆地区的兵力部署；各集团的人员配备、军事素质、武器装备、战斗能力、指挥官特征；西南的重点防御地区和防守薄弱地区，并建议我军先占领贵阳，切断蒋军逃滇的退路，同时又向川东西、秀、黔、彭地区进军，这一带是蒋军防守兵力薄弱的空隙。”这样一来，解放军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已是了如指掌。

二、解放重庆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和中央军委的命令，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攻势，从而揭开了解放重庆的序幕。

突破川鄂湘边防线 “川鄂湘边防线”是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形最为复杂的地段构筑的防线。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宋希濂集团投入6个军10万人。川黔战役发起后，我十二军迅速攻占红安，解放秀山；五十军突破敌一百二十四军防线，在咸丰歼敌七十九军；四十七军在大庸、桑植全歼敌一百二十二军，又配合十一军在龙山、来凤歼敌一百一十八军。宋希濂集团精心构筑的“川鄂湘边防线”全线崩溃。

突破乌江防线 1949年11月中旬，宋希濂集团在“川鄂湘边防线”被突破后，快速集结3万余兵力，凭借乌江天险，在彭水部署川东南第二道防线——乌江防线。十一军解放黔江后直插郁山，十二军强渡龚滩，穿插迂回在彭水县城周边，对宋希濂残部构成合围之势，激战至21日，我军在彭水县城南突破乌江，直指黄家坝，乌江西岸防线守敌全部弃阵而逃。在向彭水进军的过程中，我十二军三十六师参谋长安仲琨在马头山遭敌伏击牺牲，成为解放大西南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

突破白马山防线 白马山地处武隆县西南，是渝东南的重要门户，地势险要，森林密布，宋希濂将剩余的3万余兵力集中在白马山，设下五道防线。我十一、十二、四十七军共8万兵力投入战斗。1949年11月22日，四十七军率先在茶园敌第三道防线打响战斗，茶园防线突破后，在豹岩将据守第四道防线之敌截成几段进行围歼，十一军、十二军在朝天望破敌第二道防线，对万家艮第一道防线之敌实施夹击、突击、围歼。至此，白马山防线大势已去，第五道防线已形同虚设，被我军迅

速突破。11月24日，南川解放。白马山战斗共毙敌3000余人，俘敌12000余人，敌十四兵团司令、中将钟彬在涪陵白涛镇被活捉。

宋希濂精心布置的三道防线被我军突破后，国民党盘据多年的西南重镇、妄图借此再做“复兴”美梦的重庆，已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与此同时，二野五兵团及第三兵团第10军所部，从湖南芷江直入贵州，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21日攻占遵义，并乘胜向黔北、黔西北、黔西南追歼逃敌，迅速解放贵州大部，切断了川陕甘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逃往滇桂黔的退路。

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川黔战役进行中的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川、康、云、贵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并明确指出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的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11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又致电所属第三、五兵团及第十、十一、十二军，希望“各军师团长向当面敌人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将《四项忠告》广播词抄收普遍印送敌军中去，藉以瓦解敌人。”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与国民党防线的频频告急，蒋介石于1949年11月14日再次飞到重庆，企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在重庆的近半个月时间里，蒋介石频频约见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固守重庆、保卫西南”，并派蒋经国赴川东前线视察督战，调胡宗南的第一军至重庆增加防卫力量；美国参议员诺兰也飞抵重庆，为蒋介石鼓劲打气。但所有的这一切，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都是枉费心机，无济于事。在此情形下，国民党当局眼见重庆不保，不得不于11月21日做出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再迁成都的决定。在逃离重庆之前，蒋介石亲自命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屠杀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全部政治犯，同时破坏重庆的城市建设和市政设施。为此，毛人凤多次召集特务头目开会，布置任务，还专门从台湾调来“东南技术总队”实施破坏活动。9月6日，国民党特务首先屠杀了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等6人，以后又分批屠杀了革命志士数十人。11月27日，当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隆隆炮声传到歌乐山麓之际，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竟将各处关押的政治犯近200人集中在一起，用机枪集体屠杀，然后又浇上汽油，放火焚烧，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惨案。

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破坏城市建设与设施的同时，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则为保护重庆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审时度势，及时地将先前进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武装起义，引导到迎接解放、保护城市和配合接管的工作上。他们或利用

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中进行策反工作，以将敌人的破坏损失减到最小；或组织护厂队、护校队，保护工厂、学校和城市，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或想方设法，积极营救被关押的革命志士。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重庆城市的安全，极大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为重庆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战局的发展态势，向所属各部队发出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要求“十二军应速向綦江继进，捕歼陈春霖之四十四军，尔后即直趋卷江场（綦江河口有船），准备渡江迂回重庆；十一军、四十七军速协力捕歼冷水场、龙潭场地区及向重庆木洞镇逃窜之罗敌主力，尔后十一军即以一部出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出渔洞镇，准备渡江，协同十二军，视机解放重庆。”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密切地关注着西南战事的发展。11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二野缓进重庆。电文如下：

“刘、邓并贺、李：

根据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800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以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后，刘伯承、邓小平等紧急商议，慎重分析研究当时的实际情况，仍坚持速取重庆的既定方针。理由是：我军在长江南岸消灭敌有生力量后，蒋介石可能改变增援重庆的计划；我军进军迅速，援敌难以赶至；我军迅速渡江控制泸州、乐山，可立即截断敌军退路，特别是在考虑到夺取重庆的直接意义后，当即由邓小平起草了和刘伯承等联名致中央军委的电报：

“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广文），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的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全军经营全川。重庆城地形险要，如敌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在敌薄弱时，至少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提前渡江，并视情况包围或夺取重庆为较妥当。”

刘伯承、邓小平等也表示，上述考虑“是否有当，请核示”。11月28日，毛泽东回电同意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并请他们“依情况发展酌定之”，充分体现了对刘伯承、邓小平的信赖。

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我四十七军、十一军、十二军兵分三路，向重庆迂回前进：北路四十七军经涪陵沿江而上，中路十二军由南川向西挺进，南路十一军由綦江向北包抄，并相继于11月27日、28日攻克重庆外围的江津、顺江场、鱼洞镇等

据点，向重庆城区进逼。而此时防守重庆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是溃不成军，望风而逃，人民解放军只在重庆近郊的南温泉、黄桷埡等地与国民党守军发生小规模战斗，即顺利突破胡宗南所部的“新长江防线”。夜宿于重庆西郊歌乐山林园的蒋介石，见势不妙，于11月30日凌晨匆忙乘车前往白市驿机场，仓皇逃往成都。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十一、十二、四十七军的5个营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进入重庆市区，重庆喜获解放。至此，国民党政府经营了10余年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重镇——重庆，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是重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是重庆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从此以后，重庆人民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向着建设新中国与新重庆的目标昂首迈进。

三、接管重庆

重庆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在这一地区最为集中的城市，是国民党政府在败退大陆前盘踞的最大城市和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所在。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之后，先前集中在这些地方的各种反动势力大都逃聚在这里，使重庆成了各种反动势力聚集和活动的大本营。据重庆市公安部（后改为局）部长刘明辉1949年12月16日在重庆解放后的中共重庆市委第一次常委办公会议上报告，解放后的重庆的基本情况是：市区共有413保，801甲，212255户，1003756人；其中土匪、扒手、小偷，解放前约10000多人，大部持有枪枝；袍哥约10多万人；解放前国民党收容在流民习艺所的有2000多人，街上零星的尚未计入；散兵游勇、失业军官、在乡军人具体数字虽然不详，但遍街皆是；职业特务约6000人，此数还不包括王陵基等地方系统的特务在内。因此，解放后的重庆，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热烈庆祝、欢声雷动、兴奋愉快；“另一方面是满目疮痍，特务匪徒到处潜伏进行阴谋破坏，散兵游勇流浪街头，十万左右的旧有员工等待接收、安插或处理，大批学校员生亦等待救济与复课，工厂遭受着大的破坏，……城乡和内外的交流与商业亦在停滞状态中。”由此一来，在推翻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后，如何把重庆顺利地接管过来，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就成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重庆人民的首要、共同任务。

为了接管好重庆，把旧有政权机构尽快地转移到人民手中，刘伯承、邓小平及二野前委高瞻远瞩，早在进军重庆途中，就为接管重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为接管重庆做了干部上的准备。早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在拟定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部署时，就在南京确定并任命了接管重庆的主要领导班子，决定由二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副主任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重庆市市长，主管军管会工作；二野第五兵团副政委张霖之任市委第二书记，主管党务和群

团工作；西南服务团副团长曹荻秋任市委第三书记，主管政府工作。在解放上海、杭州后，二野又调遣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大批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等地的进步青年学生，着手筹组西南服务团，随军西进，参加西南各城市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当人民解放军进军到湖南常德后，又对入城接管的干部队伍进行配套，共抽调 2470 名干部作为接管重庆的骨干力量。这样，在接管重庆的干部队伍中，有些负责同志参加过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具有一定的城市工作经验；其他干部大多数是久经考验、对党忠诚的老干部、老战士，富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饱满的革命热情，他们是重庆得以顺利接管的重要保障。

其次是对接管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规定了新解放区和城市接管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政策。1949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提出了对新解放区的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在嗣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党中央又对有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社会改造、建立新秩序、建立新城市而斗争的方针进行了强调。遵照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刘伯承、邓小平利用二野部队在常德休整的间隙，专门召开接管干部会议，并分别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情况和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张霖之作《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就目前接管的有利条件、接管的方针方法与步骤、接管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及接管的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指出：“我们要依靠工人，并必须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大胆地吸收革命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工作，大胆地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样，我们的接管工作是完全可以搞好的。”从而为重庆的顺利接管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

此外，川东及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也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将主要工作从农村转向城市，积极开展“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护厂、护校、护城斗争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上层统战与策反工作，从而减小了敌人对重庆的破坏和军事抵抗，使重庆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这也为重庆的顺利接管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1949 年 12 月 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委员会的部分主要领导干部 19 人抵达重庆，即日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接管工作。重庆市军管会以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谢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阎红彦、王近山、王蕴瑞、任白戈、罗士高、刘明辉等 12 人为委员，张际春为主任委员，陈锡联、张霖之为副主任委员。针对重庆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重庆市军管会采取了“稳步前进，有重点有步骤的接收”方法，并制定了正确的接管方针，即：自上而下按系统的接管，不准搞乱系统，乱抓乱接；“大力动员工人职员群众及地下党的力量参加接管，使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工人，团结学生，进而争取团结各种职员、科学家、技术人员、进步的工商业者等，向他们宣传解释城市政策与接管方针、

计划、办法等，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吸收他们参加协助接管工作。

依照“按系统接管”的方针，重庆的接管工作共分为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文教、公安等七大系统，并组成六个接管委员会和一个公安部，分别接管与之相对应的原国民党中央机构与省市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军事单位、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其所属单位的一切物资财产、档案材料和全部人员。北碚划归重庆后，又于12月12日设立北碚军管分会，专门负责北碚的接管工作。

为了加强领导并集中一切力量搞好重庆的接管工作，在接管期间，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一切权力的中心，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领导，也都是通过军管会来贯彻和实现，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一致性、权威性和严肃性。随着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逐渐建立，接管工作的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尚在接管中的逐渐交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接管；已接管完毕的则开始转向管理。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重庆市整个接管工作的胜利结束，重庆从此走向建设“人民的生的新重庆”的新阶段。

从重庆解放到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整个重庆的接管工作历时50余天，共接收了机关、工厂、银行、仓库、公共场所、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不包括学校）374个；接收人员（包括学生）100647人；接收的物资主要有黄金10796两、白银8555两另777公斤、银元148690元、美钞50218元、大米6762石另17吨、稻谷15561石、食盐95758担、大小好坏汽车1883辆。在接管干部不足、形势错综复杂、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顺利完成接管任务，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和巨大成就，它为重庆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重庆社会秩序的整顿和恢复、为重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物质基础。

目 录

第一篇 解放前重庆概况

一、解放前夕重庆市概况	
解放前夕重庆的基本情况概述	3
解放前夕重庆的政权机关概况	9
解放前夕重庆的教育概况	14
解放前夕重庆的经济状况(节录)	19
解放前夕重庆的驻军概况	
(一九四八年二月)	47
二、国民党当局对重庆的经营与防守	57
国民政府文官处为重庆行辕等改为绥靖公署致重庆行辕代电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	57
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为奉令改为绥靖公署致重庆市政府代电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57
重庆市政府为奉转实施戒严给所属的密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57
重庆市政府为准实施交通统制给所属的密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58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为指示确保西南安定原则三项致重庆市政府代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58
西南长官公署为核定该署副主任致重庆市政府代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60
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郊应变计划	
(一九四九年五月)	60
蒋介石在重庆机场的书面谈话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66
蒋介石在招待重庆各界茶会上的致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	67

国民政府迁渝办公令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二日).....	68
李宗仁在飞抵重庆机场时的书面谈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	68
国民党留渝立法委员所拟《迅速集中力量,巩固西南,扭转危局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69
重庆市暨卫戍区反共救国纲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70

第二篇 解放重庆

一、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西南、解放重庆的战略部署	93
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军按番号顺序排列的命令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	93
刘伯承、邓小平等为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的命令(摘录)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93
刘伯承、邓小平关于第二野战军各军、师番号重新排定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	94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关于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编制情况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	94
中央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95
第二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军西南前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96
中共中央华东局、总前委关于部队进军川、闽及攻青岛等部署向中央军委	
的报告(节选)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97
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南的几个问题给第二野战军前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98
中央军委关于二野入川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	99
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99
中央军委关于二野西进时间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	101
毛泽东主席关于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致彭德怀电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101